

文史哲研究丛刊



明代唐诗学

孙春青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史哲研究丛刊



明代唐诗学

孙春青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唐诗学/孙春青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11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7-5325-4409-5

I. 明... II. 孙... III. 唐诗—文学研究—中国—
明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0101 号

责任编辑 冯海荣

封面设计 严克勤

文史哲研究丛刊

明代唐诗学

孙春青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875 插页 5 字数 240,000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7-5325-4409-5

I·1871 定价: 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孙春青 女，1974年4月出生，河北新河人。1998～2001年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师从马歌东教授；2002～2005年6月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张毅教授；现任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学思想史。已在核心期刊发表《〈唐诗品汇〉与明初唐诗学》、《高棅“声律纯完”辨析》、《论高棅的“正变”观》、《“盛唐之音”的声韵辨析》（第二作者）、《明人诗学视野中的韦应物论》等论文多篇。

责任编辑 冯海荣

封面设计 严克勤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
唐山师范学院资助出版

序

张 毅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所喜爱,并流传海外。把历代的唐诗接受过程作为一种审美文化现象加以描述,从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入手,总结唐诗经典化过程中的诗学理论,说明唐诗在塑造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灵与文化性格时所起的作用,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三年前,孙春青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文学院,随我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向的研究生,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建议她和另外一位同学参加我主持的唐诗接受史项目的研究工作,进行明代唐诗学方面的专题研究。经思考后,她愉快的接受了我的建议,并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投入到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中来。

按照我们的设想,这项研究要改变由作者到作品的文学史研究的传统模式,将唐诗放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加以考察,兼顾诗选、诗歌理论批评和诗歌创作的通变,研究唐诗在不同时期的经典化过程。主要研究内容应包括:一、梳理唐诗流传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不同时期人们所编选的唐诗总集与别集,有关唐诗选本的注释考辨,以及大量诗话著作里针对唐诗的理论批评等。从中发现唐诗流行的倾向性,把握唐诗传播的方式和过程。二、研究唐诗对后代著名诗人及创作风尚的影响,说明唐诗在诗歌创作中所起的典范作用,及其对中国诗学发展的影响。三、对唐诗接

受史上的一些重要诗学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探讨不同时期的人解读唐诗的具体方法和兴趣所在,及其对唐诗艺术特征的理解。说明不同时代的人对唐诗的接受与当时审美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关系。

对于一个刚进入这方面研究的年轻学子来说,提出这样的要求难免有些苛刻。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春青的研究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其《明代唐诗学》在答辩时,受到校内外专家一致好评,推荐为优秀博士论文。在吸收专家们的建议后,经过修改,现在该论文成为一本专著,将由久负盛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先行出版。这是令人高兴的事。

在明代唐诗选本的梳理和论述方面,春青这本著作的资料工作做得相当扎实。各种唐诗选本的大量出现是明代唐诗学繁荣的标志,据孙琴安先生的《唐诗选本提要》统计,明人所辑的唐诗选本有216种,远远超过唐、五代、宋、元所辑数目(83种)的总和。根据孙先生著作提供的线索,春青不辞辛苦,多次到北京、南京和上海等地查阅资料,对现存的明代唐诗选本做到了心中有数,并以明代各种唐诗选本出现的先后为主线,编制了《明代唐诗学年表》。这就为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了可进一步开拓的论说空间。因为在此之前,有关明代唐诗学的研究渐成热点,已有一些优秀著作出版。如陈国球先生的《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朱易安先生的《唐诗学史论稿》,陈伯海先生的《唐诗学史稿》等,都是功力深厚的著作。要在明代唐诗学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取得发言权,必须往深里做,往细处做,这也是专题研究的要求。只有发掘出新的材料,才有可能产生新的观点,才能杜绝无根的游谈,也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开拓。春青的这本著作是做到了这一点的。她对《唐诗品汇》和《唐诗正声》的深入研究,对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出现的唐诗选本热的分析,对明末的唐诗整理与唐诗学关系的探讨,都以翔实的

资料为基础而饶有新意。

明代是唐诗学的昌明时代。所谓“唐诗学”，指有关唐诗研究的学问，从唐代的唐人选唐诗开始，历经宋元，至明代进入了成熟时期。明人不论是在唐诗的编选辑佚、笺注考证等方面，还是在唐诗体派的界定、唐诗格调与神韵的辨析、唐诗创作技巧的总结等方面，都比前人要全面和深入得多。春青的这本著作，力图将明代唐诗选本研究、明代唐诗理论批评研究和明人诗歌创作研究结合起来，全面彰显明代唐诗学的价值和意义。她以为明初的唐诗学与当时的诗坛风尚联系密切，唐诗选评里的注重“审音律之正变”，与创作中提倡“鸣国家气运之盛”相呼应，形成注重世运升降而提倡专主盛唐的风气。从以“格调”论唐诗，到逐渐走向以“神韵”、“性情”论唐诗，明人对唐诗的美学特质的揭示和重新阐释，是明代唐诗学的重要理论成就。明代的唐诗学与复古诗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唐诗学也是明代复古诗论的一部分，这集中体现在明人“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的观念上，他们对古体、近体诗体制特征的细致探讨，体现着明代唐诗学在体制讨论方面的具体成就。这些看法揭示了制约明代唐诗学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联系，是对明代唐诗学的理论总结。

作为专题研究论著，春青这本著作的出版，可视为唐诗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这项研究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各种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一部资料翔实、视角新颖和有理论深度的唐诗接受史。力图贯通古今，展示历代的唐诗流传情况，说明唐诗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所起到的陶冶性灵和铸造人格的作用；然后上升到民族精神和诗性智慧的思想层面加以分析，全面总结唐诗对于审美文化和诗歌理论批评的经典意义，探讨唐诗作为民族心灵的语言艺术载体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永久价值。

引 言

一

唐诗学是一门有关唐诗研究的学问^①，唐诗研究萌芽于唐代，历经宋，至明代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所谓全面，是指明人不论是在唐诗的编选辑佚、笺注考证等方面，还是在唐诗体制的界定、风格的辨析、审美内涵的发掘、创作技巧的总结等方面都比前代全面和深入，从而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唐诗学。有明一代是唐诗学的昌明世代。

有关唐诗学的研究，近些年来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如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 1988）对唐诗学术史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勾勒，成为新时期唐诗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其中对明代唐诗学也概括地进行了全面勾勒。朱易安的《唐诗学史论稿》（广

^① 唐诗形成一门学问，始于唐代；而唐诗之称之为“学”，却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陈伯海撰写《唐诗学引论》，提出：“唐诗的巨大成就，吸引着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去反复诵读，刻苦钻研。一千多年来，围绕着这块宝藏，历代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了大量开发工作，无论在辑佚、选编、笺注、考证、解析、品评或其他专题论述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述浩繁，不下几千种。可以说，唐诗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唐诗学。它也和古典文学领域里的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词学、曲学等一样，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课题范围、工作方法和科学体系。”（《唐诗学引论》，东方出版中心 1996 年第四版。初版于 1988 年）

西师大出版社 2000),侧重于唐诗学史的体系建构以及唐诗学批评方法的渊源和传承,包括对明代唐诗学史的描述;香港学者陈国球《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对明代复古诗论涉及到的唐诗学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证,但对明代唐诗选本和唐诗对明人诗歌创作影响的论述较少。陈伯海主编的《历代唐诗论评选》(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3),《唐诗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4),辑录了丰富的唐诗论资料,扩展了论述范围,但由于采用传统的文学史叙述方法,使其停留在诗论和现象的描述,问题意识不够突出。对于唐诗学与明人诗歌创作的关系,唐诗论与古诗论的关系,唐诗刊本与明代唐诗学演进的关系,以及对明代唐诗学重要的理论范畴诸如“格调”“神韵”等的阐释,前人还言之未详。而这些正是本文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把明代唐诗学的研究确定在唐诗的传播、唐诗论、唐诗对后代诗人的创作影响等三个方面,从对明代唐诗选本(集)的编选刊刻入手,结合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立足翔实的资料,采取历史演进与主要问题揭示相结合、文本解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法,描绘明代唐诗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力图将明代唐诗选本研究、唐诗理论研究和明人诗歌创作研究结合起来,凸显明代唐诗学的价值和意义,揭示影响明代唐诗学发展演进的各种因素的逻辑关系。

唐诗学演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充实增加新元素的过程,新的观念可能在对旧观念冲击中产生,而后共同完成着唐诗学史的沉淀。在这个理论前提下,我们评判明代唐诗学成就的基准是:是否为唐诗学增添了新的质素,其中是否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对后人的唐诗研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二

唐诗选本的大量出现,是明代唐诗学繁荣的标志。据今人孙

琴安先生的专著《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的钩沉,明人所辑的唐诗选本有216种,远远超过了唐、五代、宋、元所辑数目的总和(83种)。事实上明代编选刊刻的唐人集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因为有明一代的唐诗刊刻形式极为多样,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唐诗总集、别集、选本的刊刻达到三百余种(次),这为唐诗的保存、传播和普及作出了极大贡献。明代唐诗刊刻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一、对某个诗人别集或合集的刊刻;二、大型唐诗总集的刊刻;三、前人或前代的唐诗选本,包括明人重新校注和评点的选本的重刻;四、明人自己编选的唐诗选本的刊刻与再刻。有相当一部分活跃在明代诗坛或者对明代诗歌创作影响深远的诗人学者都参与了唐诗集的编选、刊刻、笺注和评点,从而使得唐诗集的流播与明代的诗歌运动结合起来,提高了明代唐诗选本的文学价值。

明代唐诗刊刻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与当时的诗学风尚关系密切。因此透过这些唐诗选本(集),可以大致推测到其时诗学思潮的新动向。

从明初至正德时期,是明代唐诗选本(集)刊刻的初始阶段。其时唐诗并未流行,零星刊印的大多是前人的选本,较为流行的如“唐人选唐诗”、《三体唐诗》、《唐诗鼓吹》、《唐音》等。但在明初浓厚的尊唐氛围中,在各种条件的推动下,出现了明人第一个重要的唐诗选本《唐诗品汇》。高棅的这个选本,以古体、律绝、五言、七言、六言诸体发展为经线,诗人作品为纬线,以时代世次发展为序,实现了“审音律之正变”、“别体制之始终”的完美结合,发展了《唐音》以体制来构建唐诗史的创举。高棅以“四分”代替“三分”,使唐诗史的时代划分界限更为明确;又以“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傍流”九品目,代替“始音、正音、遗响”三段,对唐诗史的发展过程比《唐音》分析得更为详尽。这样就解决了明初唐诗学视野中杨士弘编选《唐音》的不足,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依据“音律之正变,世次之升降”建构唐

诗史的理想。在编选《唐诗品汇》的同时,高棅又别选《唐诗正声》,以“声律纯完”作为别裁伪体的标准,精炼了对盛唐之音的定位,明确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的审美理想。这两个唐诗选本奠定了明代唐诗学以辨体和审音为中心的理论基础,在明代流播甚广,对明代中期盛唐诗风的形成有深远影响。

从嘉靖时期到万历中期,明代唐诗选本(集)的刊刻掀起了高潮。唐诗总集刊刻的种类和数量都骤然增加,除了《唐音》和《三体唐诗》之外,大部分都是明人编选。从这些选本的序跋中来看,明人对唐诗的传播和接受积极主动,带有较强的文学倾向和一定的理论色彩。李白、杜甫别集、“十二家集”、王孟合刻、李杜合刻、四家合刻等初盛唐诗人的集子非常流行,反映了当时唐诗学领域诗学盛唐的理论动向;先后主盟诗坛的李东阳、李梦阳开以“格调”论唐诗的风气。在“后七子”中,李攀龙再举“诗必盛唐”的诗学纲领,使得嘉靖前期一度流于旖旎柔婉的初、中唐诗风重新振作,促使嘉、隆诗坛继弘、正之后进入明诗发展的高峰期。他编选的《唐诗选》,体现了以风调济声调,以骨气济诗格的思想,把“盛唐格调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明万历中期到明末,唐诗选本(集)的编刻再起高潮,其中有代表性的选本是钟惺、谭元春所选的《唐诗归》和陆时雍所选《唐诗镜》。钟、谭和陆都受到“性灵”文学思潮的影响,他们对诗歌“灵”性的追求,在《唐诗归》里倾向于性情和心绪的“清幽”;而《唐诗镜》表现的是对澄净灵澈的审美意境和淡远闲雅的氤氲意蕴的追求。《唐诗归》选诗侧重于那些表现诗人“真性情”、投注“真精神”的作品,而《唐诗镜》则对具有清丽新雅的词藻、流畅抑扬的节奏和明净安闲的情调的作品更感兴趣。《唐诗归》重视唐诗批评中的接受方式、注重对唐诗所体现的诗人精神的发现,完成了明人唐诗批评视角和话语的转换;《唐诗镜》以“韵趣”观照唐诗,对明人“格调”、“声韵”的评价标准有所补充。明末部分唐

诗选本(集)是在明前辈刊选的基础上重刻的,汇评本、合刻增订本增多,尤其是明代几个重要的唐诗选本如《唐诗正声》,李攀龙《唐诗选》,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等的合刻汇评套印本极为流行。无论是总集、合集、别集还是选本的刊刻传播,在唐诗观念和研究方法等诸方面都体现出整合的特点。明末最后一部大型唐诗总集《唐音统签》的出现,为唐诗的搜集整理和保存传播作了大量工作,同时也为《全唐诗》的结集奠定了基础。

三

对唐诗美学特质的揭示和重新阐释,是明代唐诗学的重要理论成就。从以“格调”论唐诗,到逐渐走向以“神韵”、“性情”论唐诗,明人对摹拟唐诗的作法经历了一个扬弃过程,对唐诗发展史的讨论也日趋细致。这是一个逐渐走近唐诗本体的过程。还原并描述这一过程,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明代唐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明初流行以“正变”论唐诗,“文章盛衰关乎世运”成为焦点问题,世变论是诗歌批评的主要依据。同时,明初诗坛有着强烈的“鸣盛”倾向,创作中体现出一种昂扬积极、豪壮阔大和从容雅正的文学风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唐诗分期问题很自然地 and “审音律之正变”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国家气运蒸蒸日上的大背景下,在创作主张和诗学思想一致“鸣国家之盛”的主旋律影响下,“专选于盛唐”在所难免,它深刻地反映出明初唐诗学大的趋势和走向。高棅的“正变”观念以“世变论”为基础,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勾勒了在时代影响和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双重作用下的唐诗史。他以盛唐诗歌为正声,作为阐释唐诗“正变”的依据,构建了其自足的唐诗学体系,影响了有明一代的唐诗学。

洪武之后,在“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的复古思想的影响

下,摹拟唐诗成为一时之风尚。在诗法流行的语境中,“格调”成为论诗者用来探索、把握唐诗创作法则的重要概念范畴。以“格调”论唐诗,其始主要探索近体诗之“格”,致力于把性情的表现和谋篇布局的规则结合在一起,把握近体诗的创作规范。至成化、弘治年间,李东阳以声调论诗,重视诗法,强调诗之“格律”,主张“调”与“格”相辅相成,互相融合,提倡和谐雅正的声调之美。而后,李梦阳倡导以“诗法”入手,力图以盛唐雄浑豪壮的诗风来振作成化以来萎靡不振的诗坛,他所规摹的盛唐格调,包含音调与体格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以唐诗为宗法对象的时代风气中,虽然同主格调,不同地域的文学团体,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金陵诗人群以“风调”言唐诗情韵;吴中诗人群则欣赏白居易诗深长的“情味”和语言的平易流畅。他们以风调、情味济格调,对于规摹“盛唐格调”易产生的流弊有所匡正。

至嘉靖时期,以谢榛、王世贞、李攀龙为杰出的后七子崛起,重新高扬崇尚盛唐的诗学理想,使明代唐诗学进入了一个辉煌阶段。他们并非是李何唐诗观念的简单重复,而是汲取了时代的特点,从审美鉴赏的层面,赋予了盛唐诗歌更加丰富的内容。他们以“骨气”之“格”易诗法之“格”,以“风调”之调实声韵之“调”,从而使得唐诗“格调”由创作论走向了审美鉴赏论,把“盛唐格调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诗论家胡应麟则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揭示了盛唐诗的“神韵”之美,并辩证地阐释了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之间的关系。格调与神韵,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形式,后者是前者的精神升华,二者不即不离,共同构成盛唐诗歌的审美特质。明人对盛唐之音的认识,经历了从混沌中走向具体而微的诗法,再试图超越有限的形迹限制,走向无迹可求的心灵感悟,这样一个复杂的探索过程。虽然还不能完全准确地把握住盛唐诗歌的韵外之致,但确实是越来越靠近了诗歌艺术的理想境界了。

万历中后期,公安派的“性灵”说对其时的诗学观念产生了

重要影响,唐诗学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具体体现在“诗必盛唐”的观念受到冲击,中晚唐诗得到重视,这些都使得明后期的唐诗学呈现出新的面貌。唐诗批评视角更加多样,批评话语也丰富起来。《唐诗镜》倡导唐诗之“韵趣”,《唐诗归》强调唐诗之“精神”,重盛唐者依旧标举“调高力厚”、“浑成合格”,选中晚唐诗者流露出崇尚“丽情才调”和诗之“艳”者的倾向,形成融合“体格纯正”、“高华雄浑”和“秀逸”的审美趣味。经过反省和修正,人们的宗尚态度开始走向调和、折衷,使明代唐诗学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自足的体系。而一些新的崇尚对象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出现,以及对明代唐诗学的反观和批评,又使得明代唐诗学呈现出开放的态势,从而保证唐诗学的新鲜活力。

总之,就唐诗学而言,明初的“正变”论建立在“鸣国家之盛”的文化背景之上,关注对象是唐诗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三李的“格调”说建立在诗歌创作论基础上,关注对象是唐诗的创作法则;胡应麟的“神韵”说则建立在诗歌鉴赏论的基础上,关注对象是唐诗的审美风格。无论言“正变”、“格调”,还是标举“神韵”,论者都把目光投在盛唐诗歌的杰出成就之上,但在对“无迹可求,无工可见”的玲珑意境美的追求中,势必掩盖或忽视了作为唐诗组成部分的中晚唐诗。“性灵”说的流行使得明人在中晚唐诗歌的研究里,发现了唐诗的另一种,甚至是另外的多种美,把关注对象投向了唐诗中的生命个体,投向了唐诗中隐秘幽微的生命心灵的律动。

四

明代唐诗学与复古诗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唐诗学也是复古诗论的一部分,二者的互动关系集中体现在明人“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的观念上。对古体、近体诗体制

特征的探讨使得汉魏古诗、唐诗审美特征的探讨深入和细化,其交汇点实际上体现在对韦应物诗和杜诗的批评上。对韦五古诗的批评体现了唐诗学与复古诗学之间的联系,对杜近体诗的批评则揭示了对唐诗批评深入的发展进程,二者同时体现着明代唐诗学在体制讨论方面的成就。

在明代唐诗学视野中,韦应物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他生活于大历前后,其五古诗风却超越时代,与陶渊明并称,较为直接地体现了汉、魏、六朝古诗与唐代古诗的联系。明初韦应物的诗歌很是流行,大多数诗人都有拟韦和韦之作,对其诗风的天然古淡及高情远韵极为推崇,并开始以“陶韦”并称,认为学古诗须从韦诗入。高棅明确将韦应物置入中唐,但还是“不拘世次”将韦五古列入名家,也注意到并强调了韦应物与唐代诗人迥异的审美特质。随着明人辨体意识的增强,对韦应物诗歌的研究也趋向深入细致,并明确集中于韦之五古。如果说明初诗坛有着明确崇唐倾向的话,“前七子”的诗歌主张就有了显著变化。他们普遍认为“格以代降”,唐诗成就不如汉魏古诗。李梦阳《缶音序》云:“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何景明则提出:“盖诗虽盛称于唐,其好古者,自陈子昂后,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者,犹未尽可法之也。”(《海叟集序》)此论在其时影响很大,自然将人们的视线牵引到汉魏古诗与唐古之间的差异上来。有人认为,唐人虽多已入律,韦诗“犹尚古多律少”,独能超然其上。但是也有人注意到,韦应物五古成就在超越唐人的同时并不能完全脱离时代环境。即以古诗入律,显然认为韦应物一部分五言古诗是“唐古”。

至后七子时代,李攀龙说:“唐无古诗而有其古诗。”王世贞还曾说过韦应物与江淹都无法相比,更不用说“陶韦”并称,超越谢灵运了,对韦应物五古的评价至此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胡应麟的古诗论与王世贞“格以代降”论相似,认为时势的发展使得唐诗不